

導 論

自改革開放於1978年底啟動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速度和持久性方面都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這40多年裏，中國經濟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長，從未中斷，儘管近年來的平均增速已降至6%左右。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3,890億美元擴展至2022年的17.37萬億美元（均以2022年的價格和匯率來計算），增幅近45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相當於最大經濟體美國的GDP的68.2%。最令人矚目的是，在1978至2023年的45年裏，雖然國內外發生過多場危機，中國的實際GDP卻沒有在任何年份出現過下滑（即增長率為負值）。當然，由於新冠疫情於2019年底在武漢爆發，又於2022年在上海再度興起，2020和2022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分別下跌至2.2%和3.0%，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低和次低的年份。

中國在這段時期取得的成就與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1949–1978）也形成了鮮明對比。之前的年增長率波動巨大且難以精確估算，最高點為1952年的22.3%，即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前的一年，最低點為1961年的-27.3%，即1959–1961年的大饑荒的最後一年。即便如此，改革開放前這段時期的年均增長率也達到了相當可觀的7.5%。如此高的增速部分源於共產黨在1949年勝利結束內戰後帶來的快速經濟復蘇。¹ 如果除

1 對1958–1959年的大躍進時期的中國經濟統計數據的可靠性，也存在某些疑問。

去1949–1952年的這段恢復重建時期，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年均增長率依然有6%，高於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1949至2022年的中國實際GDP（以2022年美元價格計算）的水平與增速如圖0.1所示。

由於中國的人口在1978–2022年持續增長（隨後出現首次下跌），人均實際GDP增速低於實際GDP總量，但差距不到2個百分點。中國的人均實際GDP從1978年的404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12,309美元（以2022年價格計算），年均增速達到8.1%，未出現任何中斷，總增幅超過30倍（見圖0.2）。中國從一個極為貧窮的國家——人均GDP略高於每天1美元的基本生存水平——成長為中等收入國家，²僅用了一代人多一點的時間。³當然以人均GDP指標來看，中國經濟如今在世界上仍然只排在第70位以下。在改革開放前的1949–1978年，中國的人均實際GDP的年均增速為5.2%。如果把1949–1952年的恢復重建時期排除在外，這一速率將降至4.0%。與之相比，改革開放後的人均實際GDP增速翻了一番多，達到8.1%，主要應歸功於經濟改革和開放措施，另有約1個百分點或許是源於1980年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後，中國的人口增速下降。⁴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發展取得了極為盛大與超出預料的成功。1979年，我以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到訪的美國經濟學家代表團成員身份，首次踏足中國內地。這個代表團由美國經濟學會發起，成員包括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教授和勞倫斯·克萊因教授。在十位代表團成員中，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最為看好。我預測未來的中國經濟年增速能達到8%，而其他成員的預測值都要低得多，有些甚至只有1%。結果表明，中國經濟在1978–2022年實現了年均超過9%的增速。歷史上從未有其他經濟體像中國這樣可以在如此長的時期裏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長。由此很自然地出現了如下疑問：中國經濟究竟是一個奇蹟，還只是一種泡沫？中國經濟是否將如1990年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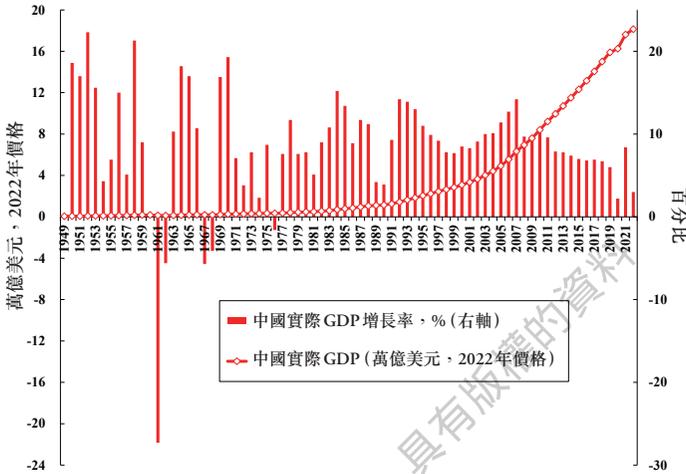
2 通常以1.2萬美元的人均GDP作為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

3 通常以25–30年作為一代人的時間跨度。

4 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了更低的人口數量和更低的居民消費，乃至更高的國民儲蓄率和國家投資率，由此帶來更高的人均實際GDP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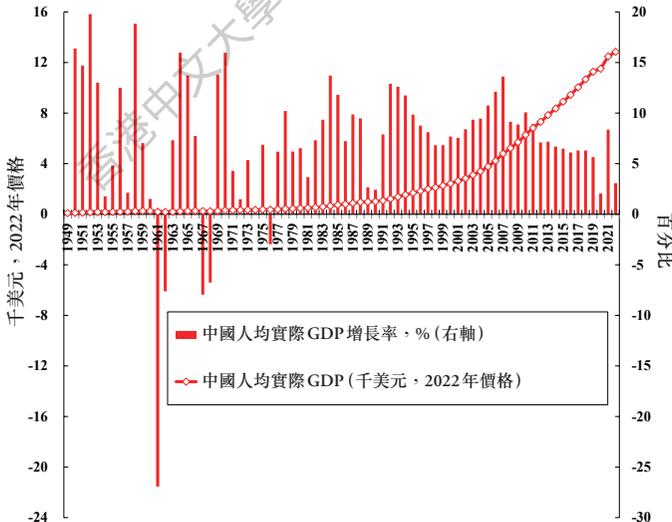
日本經濟那樣開始趨於停滯，甚至走向下跌？它能否逃離「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說中國經濟並非奇蹟，它的發展經驗能否被其他國家複製？

圖 0.1：中國的實際 GDP 及年增長率（萬億美元，2022 年價格，%）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由作者按 2022 年美元價格換算。

圖 0.2：中國的人均實際 GDP 及年增長率（千美元，2022 年價格，%）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由作者按 2022 年美元價格換算。

詞典中對「奇蹟」(miracle)一詞的定義是：「令人驚訝且樂見的事件，無法用自然或科學規律加以解釋，因此有時被當作超自然力量的表現」。中國經濟在過去45年的極為成功的發展顯然令人驚訝且樂見，但是否真的無法加以解釋？在經濟學中，「泡沫」(bubble)一詞通常是指迅速興起的有利形勢，但可能脫離現實，不太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是會持續穩定增長，哪怕速率有所降低？還是會像泡沫那樣破裂和崩潰？我希望說服讀者：中國經濟增長既非奇蹟，也不是泡沫，它會堅實穩定地繼續下去。

本書第一部及其中各章主要圍繞下列問題：中國經濟這一史無前例的高速持續增長有哪些來源？中國經濟在過去45年的歷程能否用傳統經濟學理論來解釋？

當然，對實際產出高增長率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是主要投入的高增長率，包括有形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等。這些投入在中國的增長率的確很高，無論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啟動之前或之後均是如此。1978年發起經濟改革後，自由市場得以建立，廠商被賦予有條件的自主權，這些顯然有較大的積極影響。但中國經濟中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同樣在發揮作用，例如人力資本與研發資本等無形資本的擴大、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和「邊幹邊學」效應的潛力及實現、1978年改革之前的經濟運行的初始低效狀態，以及技術進步（等同於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影響。經濟增長的這些不同來源在1978年以來有著怎樣的相對貢獻？中國經濟的增長有多少來自投入的增加，有多少源於效率的提升（即技術進步或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有多少是因為「幹得更努力」？有多少是因為「幹得更聰明」？

當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府經濟政策促進和支持，僅靠投入的高增長率並不總能成功實現實際產出的持續高增長。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都曾出現過投入的高增長率，卻未能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前蘇聯經濟就屬這樣的一個案例。政府採納的經濟戰略以及實施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可能造成不同的結果。本書第二部中的各章將回顧和分析自1978年以來，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所採納的各種經濟策略、政策和

措施。針對獨有的國情和環境，選擇恰當的經濟策略和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其中包括促進出口、維持匯率穩定加資本管制、發展基礎設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以及採納祖父準則 (grandfathering principle) 和雙軌制等。當然，我們發現中國的許多政策和措施與其他東亞經濟體 (從日本開始) 的早期發展階段有類似之處。某些經濟政策則是在 1978 年前已經成型，在後續改革中也未作出大的改動，其中一個例子是非農業生產部門的低工資政策。在 1978 年之前，非農業部門的所有勞動者都直接或間接受僱於政府，政府可以單方面決定工資率和其他僱傭條件。⁵ 低工資政策可以盡量壓縮居民總消費，讓國有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從而把國民儲蓄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此外，非農業部門的持續低工資率有助於提升其從農業部門持續吸納剩餘勞動力的能力，把這些人轉移到生產率水平較高的非農業用途。

低工資政策支持了高國民儲蓄率，⁶ 由此實現高國內投資率，而無需依賴更容易波動的外國投資、外國貸款和外國援助等的資金流入。由於儲蓄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央政府控制，這些資金可以用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例如通訊和運輸網絡、港口、機場及發電廠等對經濟發展早期階段極為重要的建設。⁷ 此外，因為每年都有新的國內儲蓄來支持新的投資，中國並沒有對幾乎完全屬國有的原有企業作出重組或私有化的壓力，從而避免了由此可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干擾。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中國內地以及臺灣和韓國的早期發展階段，都沒有像前蘇聯和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那樣，對國有企業實施系統性的私有化，部分原因或許在於它們都有較高的國內儲蓄率。在中國，許多國有企業最終發展成上市公司，到香港、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掛牌。不過在

5 其中包含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及其下屬機構，還有全部國有企業的僱員。這些人都按照相同的工薪級別來支付報酬。

6 當然，與其中東亞經濟體類似，中國居民本身也是自願性質的高儲蓄者。

7 例如在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 (1953–1957)，約有 55.8% 的總投資被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幾乎所有情形下，政府依然保留了多數股權和經營控制權，企業控制權沒有被私有化。⁸ 中國政府希望繼續保留國有企業，作為掌控經濟和推行社會政策的一種工具，如環境保護和恢復以及脫貧等。儘管如此，中國的私人經濟部門自1978年改革啟動後快速成長起來，到2021年，在城市就業人數和利潤總額中的佔比分別達到了88%⁹ 和95%。¹⁰

另一項與經濟改革啟動幾乎同時發起的措施是獨生子女政策，這項人口計劃措施在1979年公布，1980年9月正式實施，並持續執行到2016年初。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人口變化軌跡。如果沒有獨生子女政策，中國今天的人口數量至少會多出約2億，從而帶來高得多的居民總消費、更低的國民儲蓄率、更強勁的社會服務需求、更低的GDP增長率、更高的失業率、更低的人均實際GDP、更高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以及對環境更嚴重的破壞等。隨著中國的工作年齡段人口減少，社會走向老齡化，撫養率開始提高，獨生子女政策也被及時終止了，可能有些過遲。¹¹

中國政府在1978年採取的一項新的重大措施是對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開放。當時中國需要進口國內無法生產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等。為支付進口產品，中國還需要促進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而擴大出口要給人民幣設定有國際競爭力的匯率水平。從1950年代早期到1971年底，人民幣匯率一直維持在1美元兌2.46元的水平（見圖0.3）。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遭遇國際禁運，到1953年停戰協定達成後，禁運依然

8 更近期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帶有類似的特點，這一改革讓國有企業把某些下屬企業部分私有化，但依然保持多數股權和經營控制權。從原則上來講，國有企業還可以收購現有私人企業的多數股權和經營控制權。

9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

10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但遺憾的是，關於私人部門在GDP中所佔的份額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

11 不過，中國對工作年齡段人口的定義不同於其他國家。在中國，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50歲（女幹部為55歲），男性則為60歲。因此，這一工作年齡段人口的規模顯著小於人口結構類似的其他國家。

延續。除了與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易貨為主的貿易以外，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很少開展國際貿易。¹²到1960年代，隨著中蘇關係趨於緊張，有限的易貨貿易也顯著減少。阿爾巴尼亞在當時成為與中國保持經濟往來的唯一歐洲國家。不過在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於1971年7月秘密訪華，以及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2月訪華後，中國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重新開始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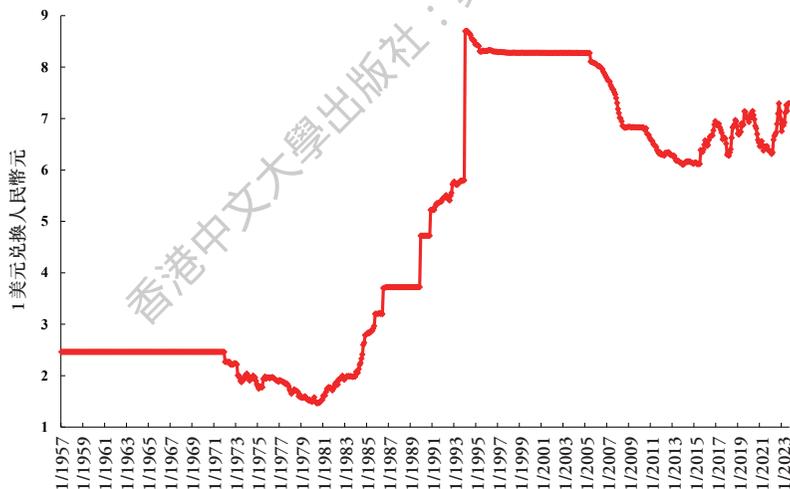
1971–1978年間，人民幣匯率事實上有所提高，到1980年達到1美元兌1.46元的最高點，部分原因是資本流入。此後中國著手推行一系列或明或暗的人民幣貶值措施以及多重匯率制度。1994年初中國實行匯率並軌和經常賬戶可兌換制度時，人民幣匯率達到1美元兌8.7元，此後略微提升至1美元兌8.3元，直至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其間儘管除香港和日本之外的其他所有東亞經濟體的貨幣都出現了大幅貶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依然保持了穩定。從2005年中期以後，由於不斷增加的巨額經常賬戶盈餘，人民幣開始顯著升值。但因為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一走勢在2008年後期終止，直至2010年才重啟。此後，人民幣匯率在1美元兌6.3–7.3元之間的較為狹窄的區域以內波動，人民幣不再追隨美元的走勢，而是參照主要貿易夥伴國的一籃子貿易額加權貨幣的價值來調整，使匯率對一般貿易夥伴國保持了相對穩定，並維持了人民幣在海外的平均購買力。

在設定有競爭力的匯率水平和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之外，中國還把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出口促進戰略的組成部分。在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漫長談判之後，最終於2001年如願以償。自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來訪以來，中國在產品和服務領域的國際貿易均實現了高速的增長，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尤為突出，年均複合增長率高達15.2%。這與之前的1950–1971年形成了強烈對比，那時的年均增

12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有大量機器設備從蘇聯進口，資金則來自蘇聯的援助和貸款。

長率僅為7.4%（見圖0.4）。如前文所述，美國和西方國家在1950–1960年代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中國還經歷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以及1966–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這些事件對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都極為不利。然而自1972年起，中國在產品和服務領域的國際貿易得以穩步增長，儘管也遭遇了一些重大波動，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等。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中國的國際貿易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實現了巨大飛躍，如今與美國激烈競爭全球最大貿易國的地位。¹³ 僅就國際商品貿易而言，中國已是無可爭議的冠軍。當然，中國的國際貿易增長率在過去幾年顯著放緩。中美之間於2018年爆發了貿易戰，並似乎仍將持續。但中國當前的淨出口額僅為GDP的2%左右，已不再是國民經濟的主要驅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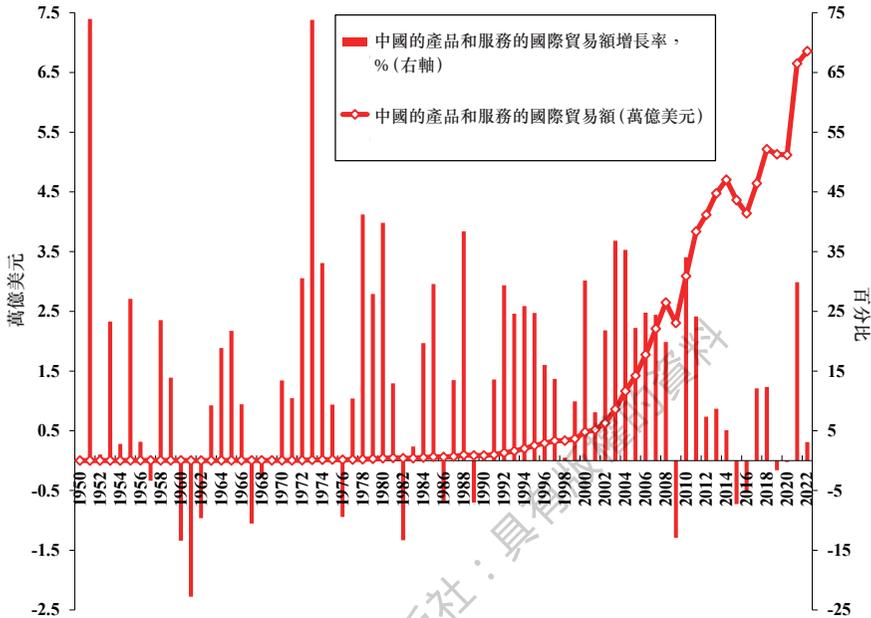
圖 0.3：1957年以來的人民幣名義匯率變化（人民幣對美元，月末數據）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3 按照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中國在2022年的產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額為6.86萬億美元。按照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的數據，美國當年的這一貿易額為6.99萬億美元。

圖 0.4：1950 年以來，中國在產品和服務領域的國際貿易額及年增長率（萬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沒有像前蘇聯那樣選擇「大爆炸」(big bang) 式的改革方式，而是採用了「雙軌制」，即指令性中央計劃繼續發揮作用且設立平行自由市場。所有的個人、集體和企業在完成指令性中央計劃規定的任務後，都可以自由參與市場活動。雙軌制改革帶來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由於所有人在指令性中央計劃之下的權利和義務都繼續實行，所以自由市場的引入並未造成利益輸家。事實上，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確保沒有輸家，這正是中國改革如此成功、經濟轉型如此平穩的關鍵所在。它在最大程度上爭取了公眾的支持，減少了反對的阻力。用經濟學術語來講，中國的經濟改革始終符合帕累托改進 (Pareto-improving) 的定義，意指讓所有人的境況都得到提升。還有，在之前的指令性中央計劃完全實施的同時採用雙

軌制，會實現全面的經濟效率。¹⁴ 因此，中國的經濟轉型極為順利，既沒有出現GDP總量和人均水平的任何下滑期，也沒有發生超級通貨膨脹，與前蘇聯和東歐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不同。

從1978年至今的整個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府還保持了較為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匯率政策。請注意，這一時期從未出現真正的衰退，即增長率轉為負值。中國對總需求的管理非常謹慎，通貨膨脹始終受到控制。從1994年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維持在與經常賬戶收支相適合的較穩定的水平。尤其是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依然保持穩定，還促進了受危機影響的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復蘇。中國也遇到了經濟難題，但目前也都得到了解決或至少較好的控制。

中國經濟改革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擁有完整細緻的藍圖。借用已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名言，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就像「摸著石頭過河」。尋找正確的前進道路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試錯是常態，實用主義作為嚮導，行之有效的會得到廣泛推廣。過河之後會是什麼情況也完全不清楚，當時只知道繼續留在河這邊並非可行的選擇。

中國政府展示出嘗試新道路的意願。不同地區嘗試了眾多試點項目，如果嘗試成功，就會被推廣到全國各地；如果成效不佳，則會被放棄。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也使它完全可以對特定政策開展獨立的試點，例如，家庭承包制就是在安徽省一條只有18戶家庭的村莊開始。一個著名的失敗試點案例則是，中國人民銀行模仿美聯儲體制建立跨省的大區分行，希望以此減少各省官員對當地貨幣供給和信貸監管的潛在影響。從原則上說，這些大區分行的領導不需要對各省的省委書記們負責。但從現實來看，該體制的運行效果並不理想，大區分行也在幾年後被各省市的分行所取代。

14 見Lau, Qian and Roland (1997)，以及Lau, Qian and Roland (2000)，內容包含在本書第11章之中。